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八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山西林业史话

王
仰
东
著

山西历史上曾是森林茂盛,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由于天灾的原因,特别是人为的破坏,使得山西的森林覆盖率下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措施,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大力植树造林,形成连片防护林体系,使山西森林覆盖率得到有效提高与改善。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8辑)

山西林业史话

王仰东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875 字数:300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34-99-9

G·117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玗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 一、上古：人类从森林中走来 (1)
- 二、先秦：农牧业向森林宣战 (6)
- 三、汉晋北魏：都城建设大规模砍伐
林木 (10)
- 四、唐宋元：辉煌的木构建筑，使森林
大面积减少 (14)
- 五、明清：边防与屯垦种恶果 (19)
- 六、民国：森林在战乱中消耗殆尽
..... (24)
- 七、当代：山西人民重建绿色家园
..... (29)
- 八、森林自然保护区是动植物
的天堂 (33)
- 结 语 (49)

一、上古：人类从森林中走来

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因地理位置处于太行山西侧，故称山西。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境内数十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在汾河和涑水河流域新石器遗址中发现木炭，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新石器遗址中发现蚕茧化石。由此推测，早在一百数十万年以前，其南部和中部地区曾是森林绵延茂盛，植被覆盖厚密，气候温暖适宜，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北部地区存在有广阔的森林和草原植被，自然景观也相当优越。当时，原始人类是从森林中和草原上获得了食物、衣着、土地、能源和生存的空间，并繁衍发展了自己。

（一）森林中和草原上的哺乳动物是人类所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近百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山西省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约1万—180万年间）人类活动遗迹300余处（地点），正式发掘的约30处，主要分布在汾河、涑水河流域和黄河小北干流。当时，原始人类一般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沿河流域，以磨制石器为工具，过着一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生活，森林草原和河流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场所。

在157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芮城西侯度遗址和匭河村遗址。两处遗址位于芮城县西侯度

村和匡河村,在中条山的西南边缘和黄河小北干流南端东岸的大转弯处。

西侯度遗址中获得 25 种动物化石和 32 种石制品。在发现的 22 种哺乳动物化石中,森林动物有李氏野猪、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剑齿象、平额象等,少数为草原动物。根据动物生态学的分析,当时西侯度的气候为疏林草原环境,植被覆盖面积广阔。鲤和巨河狸化石的存在,据 20 世纪 80 年代地质学家根据渭河下游及黄河小北干流地质钻探资料分析:约 120 万年至 600 万年前,此地为黄河小北干流的河湖时期,汾渭盆地凹陷较快,汾渭湖规模非常大,并具有一定的深度。在汾渭湖广阔水域的东边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

匡河遗址出土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师氏剑齿象、东方剑齿象、马、披毛犀、野猪、肿骨鹿、野牛等。有象和野猪等动物的存在,表明这一带曾经有茂密的森林;鹿、马等动物的存在,说明附近有广阔的草原。水牛和象喜欢温暖和湿润,而披毛犀喜欢干燥和凉爽,他们同时存在,反映出当时匡河一带基本上属温暖、湿润的气候。约 120 万年前,汾渭湖逐渐消亡,形成独立水系;渭河、汾河及其他支流从高程在 490 米以上的河湖堆积原面上侵蚀下切,潼关卡口切开,湖水东泄,东流注入渤海。河湖堆积原面也逐渐为植被覆盖。

两处遗址文化的主人过着既采集又狩猎的生活,森林草原中的哺乳动物是他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丁村遗址位于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中部,据出土动物

化石可推测,当时汾河河谷要比现在宽阔,水势很大很深,既清又缓,在附近的山上生长着茂盛的树林,山前有丘陵草原,生活着象、斑鹿、野马、野驴和羚羊、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等。这些都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据地质学家分析,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大同盆地是一望无际的湖泊,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大同湖逐渐萎缩,桑干河形成。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就在残存的湖泊边缘,这里是森林、草原、灌木相交混的地带,出没有天鹅、鸵鸟、鼠兔、中华鼯鼠、狼、虎、古棱齿象、披毛犀、野马、野驴、河套大角鹿、扭角羊、普氏羚羊、鹅喉羚、原始牛、野猪等。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喜温湿的落叶、阔叶树木稀少,而适宜偏凉气候的云杉、冷杉林大面积生长,适应干旱环境的蒿、藜等大量繁殖。

峙峪遗址位于管涔山以东、桑干河上游,今朔州市朔城区峙峪村。峙峪遗址距今 2.8 万年左右。在遗址发掘的 70 立方米堆积物中,出土以细小石器为主要特征的石制品 2 万余件;其中发掘大量石镞,这证明峙峪文化的主人已经开始使用复合工具。石镞标志着弓箭应用于狩猎活动,它可以安全地缩短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大大增加猎获量。正如马克思讲的:“弓箭对于蒙昧时代,已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此地的野生动物是人类主要的食物来源,给人类提供了较丰富的动物蛋白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速度。

据考古发现,距今 8000—2500 年前,是全新世(新石器

时代)的高温时期,阔叶林动物群向北扩展。当时,人类的活动遍及全省各地。据《山西通志·文物志》载:1980—1987年普查登记古人类活动遗址共1061处,分布在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当时,人类在各地可捕捉的兽类有亚洲象、野马、披毛犀、赤鹿、原始牛等。根据1980—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新石器时代10多处遗址的发掘,发现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啮齿类13属12种,食肉类8属8种,奇蹄类4属4种,偶蹄类16属24种,鸟类4属5种。这些动物多数仍属草原型动物,喜湿性动物极少。之后,随着气候变迁,人口不断增长,森林砍伐,草原退化,迫使动物种群迁移或灭绝。

(二)林木是人类住、行和燃料的来源。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位被称作“有巢氏”的人物。传说,他栖息在石楼县的石楼山上,主要功绩就是教人们“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见《韩非子·五蠹篇》)。当时,原始人群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庄子·盗跖》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以居避之,尽拾橡栗,暮栖土木,故命之曰巢氏之民。”把当时人类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根据近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发现,这种用枝条搭成的鸟巢式树上房屋,确实是古人类在森林中生活最早住所的形式之一。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把依山傍水的洞穴加以改造后成为住所。山西的古人类在冬天穴居,到了夏天迁往树上巢居(见《礼记·礼运篇》),也符合人类住宅需要冬暖夏凉的一般规律。

巢居因很容易损坏,也常常伴随森林的毁灭而消失,所以,至今未发现原始人巢居的遗迹。但是,从居住在热带雨林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仍可以看到巢居生活的若干踪迹。

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知砍伐森林,取用材木。根据考古发掘,涑水河流域的夏县东下冯,汾河上游的娄烦山城峁,太谷小白,襄汾陶寺,沁河流域的沁水县富裕河、下川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残留木炭。那时,古人类用采集的木材,燃起一堆日夜不熄的篝火来吓退野兽,保护人类及其住所的安全,还可以用火来御寒、照明和烤炙食物。因此,用木材作燃料是远古人类所掌握的最重要的物质力量。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还利用较为锋利的石器砍伐树木和挖掘房屋的地基,再把木材进一步加工为柱子和椽子,然后搭建成原始的木构建筑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代表是陶寺遗址群。遗址群位于临汾盆地中部的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陶寺村南。1978—1984年,考古工作者发现,遗址内先后居住过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早、中、晚时代的原始人。在3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有连片的房址、窑穴、水井、陶窑、石灰窑、墓葬、灰坑等。其中房址上有用木柱留下的孔洞和护井的木桩或栅栏状的木构件。还清理陶窑11座、石灰窑一座,据规模估算,每日均需薪材数百公斤。此时,材木已成为当时古人唯一的能源。同时,还在6座大型墓葬中发掘出棺木和随葬的木案、木觚、木勺、木杯、木斗、木仓形器、木豆、木盆等。足见古人已能利用材木制造出生活中所用的各种器皿和用具。

二、先秦：农牧业向森林宣战

新石器晚期，山西全境大部分地区森林繁茂，草场广阔，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山地、丘陵分布着原始森林，汾水、涑水、桑干河、三川河、绘河流域等平川也是草木茂盛之地。境内的东、西山（即太行山、吕梁山）地区还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草资源。同时，也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据专家的统计，先秦时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约 53% 左右。

在原始社会，人类最初栽培农作物和驯养牲畜，其经营只限于居住地的附近，规模十分有限。加上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住地以外一般都是连绵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战国时，孟子一段话比较具体地描述了那时的情况。他说，在尧时候，到处草木丰茂，禽兽繁殖，因而五谷不登，禽兽逼人，以至于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

距今 5000 年前至 2700 多年前，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西南部。尧舜时代，汾涑流域遍地森林。尧将天下禅让给舜，舜命益为虞（职掌森林之官，又名虞人），全权管理森林鸟兽之事。当时，以都城平阳（今临汾）为中心的汾涑流域，草木畅茂，禽兽众多，影响都城的建设和当地居民的农牧业生产。因此，只有焚毁和砍伐森林，驱逐禽兽，才能开垦荒地。那时，人们用的工具是石刀石斧，用来砍树伐木十分费力。据说，舜

命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才逃匿远去。如有参天巨树，焚烧时先在树干上挖一个大孔，在孔中点火，树脂融化为油，油助火势，猛烈燃烧。这样，成片的林木很快就化为灰烬。是为人力摧残森林之开始。《禹贡锥指》载：“随山刊(砍)木，有五利：一是可见山川之形势，便利规划土地；二是走山路的人不会迷路；三是可以把危害人的禽兽赶到深山老林中去；四是采集林中的果实可以救济饥民；五是砍下的木材可以用于治理洪水。

据《山海经》记载：中条山“其上多柎木”，历山“其上多榘、多栢木”，渠猪山“其上多竹”，霍山（太岳山的主峰）“其者多穀”。《水经·汾水注》记载：黄河以东的吕梁山及其支峰芦芽、管涔等山森林稠密。《诗经·唐风·山有枢》记载：今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区在西周时“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柎”；“山有漆、隰有栗”。《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山海经》均提到中条山、太岳山多木、竹，有松、柏、栲、漆、柎、谷、柞、槐等，并记述汾河中下游和涑水河流域沿岸居民区和近山地区有柞、桑、檀、榆、柎、栗生长。当时，汾涑流域和黄河小北干流沿岸是一个农、林、牧相互交错的地区。此地既有广阔的草原，又有茂密的森林，农作物也到处繁殖发育。人类已从采集、狩猎为主向种植业和畜牧业过渡。

在漫长的岁月里，山西的森林不断遭到严重破坏而不再复生，森林地区逐渐缩小。据史料记载统计，森林地区缩小的规律，大体上说以居民住地为中心，从近到远，也就是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地。森林遭到破坏有部分是自然的破

坏,如火灾、虫灾、旱灾、大风等;更严重的是人为的破坏,如开辟农田、发展畜牧、砍柴烧炭、伐木筑屋等等。特别是人们掌握了冶炼技艺,青铜器和铁器工具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加上农业生产区域的扩大和城市的兴起,森林地区和草原植被不断遭到破坏,致使山西的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野生动物大量灭绝。

从文献资料和汾河下游发掘的二里头类文化遗址看,夏朝,都安邑(今夏县北),是山西南部 and 东南部夏人家居和活动的重要地区,王室和奴隶主们已开始大量砍伐林木,用材木制造车、船、橈等交通工具。公元前 17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山西有晋(翼城)、贾(襄汾西)、郇(临汾南)、虞(平陆北)、耿(河津东南)、魏(芮城)、霍(霍州西南)、杨(洪洞东南)、潞(潞城东北)、黎(长治西南)、蒲(交口南)、徐(屯留北)等 16 个诸侯国。建置新的城邑,特别是修筑诸侯国都的城池和宫殿等宏伟高大建筑物,需要砍伐大量树木。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器(铜加锡的合金)的技术。人们用青铜制造的工具,在汾河下游的吕梁山、太岳山和太行山、中条山南端砍伐材木,并加工成为合用的木构件,用于城池和宫殿的建筑中。此时砍伐材木主要取自河谷丘陵地带的森林,山区森林仍然完好。

西周以后,实行井田制度。耕地划归自由民和奴隶所有,属于私产;全国的山林池泽属于公产,归王室和“封邦”的诸侯国贵族们所有。为此,周朝制定了较完备的森林制度,并设官员,专职掌管山林;各诸侯国的贵族也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封地内的山林池泽,以防止一般百姓

擅入,砍伐树木和猎捕禽兽。西周“封邦”后,晋国是山西境内最大、最强的诸侯国。1952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侯马晋国晚期都城或新田遗址,1956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发掘。遗址北临汾河,南接紫金山北坡,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发现有古城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祭祀遗址、宗庙建筑遗址、墓地等。其中古城址有牛村、平望、台神、呈王、马庄、北坞6座古城。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牛村、平望、台神3座古城,规模很大,分别为1400米×1200米,相互毗连,呈品字形结构。据史料载,晋国后期的新田都城是景、厉、悼、昭、顷、定、出、哀等国君住过的地方,从公元前585年营建此城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至少经历了130年的不断修建和繁荣。据地上和地下遗迹估算,古城内有大型宫殿十余座,其木质构件均大量采伐巨大树木制造。在牛村古城南发现铸铜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发掘5000平方米,出土陶范3万余块。据专家们估算,如此规模的铸铜,每日需燃烧薪材数十立方米。周显王四十四年至赧王十六年(前325—前299),赵武灵王筑丛台(今河北邯郸),大兴土木,数次征发千余人入太行山东侧砍伐材木。

战国时期,人口增殖,已有“三晋地狭而民众”的说法。当时,晋国向北包括箕、阳等地,皆在今山西太谷县境,其农业地区应更靠北面。晋国都于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绘河边),向东是沁河流域,是游牧民族赤狄族的居地。往南今垣曲县的皋落镇,原本是东山皋落氏的居地。这就是以华族为主的晋国农耕地区的规模。到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汾河流域的农业地区,已推至今太谷县南的祁县。祁

盈被杀后,祁氏食邑被分为7个县,最北的两县为孟县(今阳曲县北)和马首(今寿阳县西)。此时,山西境内的中南部平川大片森林已基本上被开垦为农田,丘陵地带的森林还很广泛。中条山西部,吕梁山南部的丘陵区田、桑、林、草相间并存,森林仍为主体。北部因人口稀少,华夷杂处,开垦较少,森林和草原相间并蓄,山区森林更为深广。中部的太岳山西侧和东部的太行山西侧森林密布。同一时期,列强之间战争频繁,行军打仗时就地砍伐木料修建营寨和用木材填井是常见之事。

秦统一中国后,当时黄河中游的平原、盆地中的森林,已被践踏殆尽;森林范围只存在于黄河小北干流以上沿岸山区。森林破坏,水土流失,黄河泥沙增多。《汉书》中载:“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历,国与永存。”“黄河”的名字第一次在史籍中出现。

三、汉晋北魏:都城建设大规模砍伐林木

据《水经·沁水注》记载,1500年前,沁河流域“步径裁通,小竹细笋,被于山渚,蒙茏茂密,奇为翳荟。”《水经·涑水注》又载,涑水流域“翠柏荫峰,清泉灌顶”。此时,汾涑流域及盆地、平川只剩下一些散生林木,已无森林。丘陵区的森林凡交通方便之处已开始遭到破坏,远地山区大片森林保留完好。两晋时,吕梁山脉以西晋西和晋西北直至黄河沿岸的广大地区,森林和草原植被茂密;西山黄土高原丘

陵区是“层松饰岩、列柏绮望”；吕梁山东侧的丘陵区也是布满大片森林。太行山的今黎城、平顺等地“山林丛密，取材甚易”，可见当时丘陵区森林很多。曹操于建安十一年（206）在北上太行山所作《苦寒行》中述“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足见太行山森林深广，动物繁多。专家们估算，汉代山西境内森林覆盖率可达45%左右。

汉魏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游牧民族内迁，晋北和晋中广大区域及晋南部分区域不断由农业区变为畜牧区，对森林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东汉初年，匈奴内讧，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单于得到东汉朝廷的允许，移屯北地郡（今甘肃马连河流域）、定襄郡（治所今右玉县西）和雁门郡（治所今代县北）、代郡（今阳高县）。匈奴诸部南迁今山西北部，最南到了五台山北滹沱河上游，意味着山西晋北地区的农业地域缩小。到东汉末年，由于匈奴踪迹已遍及汾河中游各地，诸部分别居于兹氏县（今汾阳）、祁县、蒲子县（今隰县）、新兴县（今忻县）和大陵县（今交城县南），致使大量边民内徙，朝廷只好废云中、五原、朔方、定襄四郡，并各改一县，合并设一个新兴郡。农业人口南迁后，农田退耕还草还牧，林木也相应得到保存。

之后，乌丸和鲜卑等游牧民族也不断内迁。到西晋初年，匈奴居住的地区已遍及平阳（治所今临汾西南）、西河（治所今离石县）、太原（治所今太原市西南）、新兴（治所今忻县）、上党（治所今潞城县东北）、乐平（治所今昔阳县西南）六郡。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即今山西省内包括运城之

北、雁门关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居住着游牧民族。其中,如鲜卑族等感染华风,从事农耕。又如迁来的氐人,史称其“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猪、牛、马、驴、骡”,俨然是农业定居生涯。此一时期,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界限大致在北纬三十六度线上。在这条线以北的广大地区,森林和草原相毗连,林木破坏较轻微。

西晋永嘉三年(309),刘渊迁到平阳,大力营建平阳都城。见于史载的平阳城的建筑有中宫、光极西室、南宫、东宫、西明门、西阳门、云龙门、建春门、光极殿、建始殿、鹵仪殿、逍遥园、李中堂、东市等。这些建筑需用的大量木材,均采自太岳山。

自北魏于公元398年定都平城以后,晋北成为王畿,朝廷先后向晋北移民约100万人口,并实行《均田令》,使游牧民族逐渐农业化。致使山西北部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植被被开垦为农田,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同时,山西由北到南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据史料记载,从公元398年平城建都,到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在96年期间,北魏王朝先后十几次征畿内八部五百里男丁,大兴土木,营建都城和宫殿。相继建造平城外城(即郭城),“周回三十二里”,郭城内主要是居住区的坊与宗教活动的宗庙及北魏王朝中央的各级机构;建成内城,修建了宫城的13座大门,宫城内由宫殿、宫室、宗庙、社稷、武库等建筑与设施组成;同时,建成天文殿、天华殿、中天殿、天安殿、紫极殿、西昭阳殿、永安殿、安乐殿、永安行殿、太和殿、安昌殿、坤德六和殿、乾象六合

殿、太极殿等 14 座大殿和东宫、西宫两大建筑群。据不完全统计,共消耗材木百万立方米。平城周边森林较少,朝廷不得不征数千男丁入平城西南的管涔山和东南的恒山砍伐材木。北魏孝文帝时(471—499),崇信佛教,曾下令环绕五台山增建 12 座寺院,寺院的庙宇和大殿大都是在林地毁林而建。

公元 494 年,北魏都城迁到洛阳。洛阳虽是魏晋故都,但在兵燹中遭到很大破坏,作为新都,不能不重建。新都的规模超过前代,建筑宏伟非同一般。据杨衒之《洛阳伽兰记》载:新都建筑所需的材木远取于西河(吕梁山的离石一带),大树砍伐后,由黄河水运至洛阳。北魏太和九年(485),孝文帝实行永业田制度。规定男夫一人四十亩露田(荒地),身没则还田;另男夫一人二十亩桑田,种桑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不毕者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可间种余果,多种桑榆不限。桑田为世业,称永业田,身终不还。这种农户植树的政令,对后世影响很远,隋唐各朝都沿袭照办,都起到繁荣社会经济的作用。

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后,高欢独揽大权,以大丞相坐镇山西中部的晋阳,当时人们称晋阳为“别都”。兴和元年(539),高欢建成晋阳“新宫”。武定三年(545)又大兴土木,建起宏伟壮丽的晋阳宫,门楼重迭,殿堂林立,雕梁画栋,花园假山,亭桥流水,极其豪华。北齐刘天保时(550—557),文宣帝高洋诏令,大兴土木,在五台山增建寺院 200 多座,对当地森林造成严重损害。

西魏时,韦孝宽为雍州刺史(治所长安县,在今西安市